

HAIWAIZHONGGUONVZUOJIACONGSHU

海外中国女作家丛书

变奏

头版新闻人物

周末

芝加哥重逢

飞

丛林下的冰河

水沫

丛林下的冰河

CONGLINXIADEBINGHE

上

[美] 查建英/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HAIWAIZHONGGUONVZUOJIACONGSHU

海外中国女作家丛书

变奏

头版新闻人物

周末

芝加哥重逢

飞

丛林下的冰河

水床

丛林下的冰河

CONGLINXIADEBINGHE

上

[美] 查建英/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丛林下的冰河

主 编:金钟鸣

著 者:[美]查建英

责任编辑:胡卓识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130011)

电 话: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 址: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20 千字

印 张:10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 2 版

印 次: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87-0919-3

定 价:59.00 元(上下册)

代序：穿行于双重世界之间

张颐武

一

在目前中国写作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中，“小说”这种文学的经典形式的困境已经逐步地显示了出来。激进的、天才的实验作家们一再地摧毁着、打击着我们对小说的固有信念。我们不能不赞叹马原、余华、孙甘露和苏童、格非的不羁的才华，但他们的写作活动也使“小说”脱离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脱离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他们使小说成了一种悬浮之物，一种语言能指链的无穷运动，一种敏捷、机智的游戏。小说一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惊人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十九世纪以来在欧洲发展成熟、二十世纪初叶传入中国的基本小说观念已经无可置疑地受到了根本的破坏。我们所看到的现状是，小说的命运正掌握在它的破坏者手中。这些文学顽童们用后现代的虚无主义摧毁了他们的先驱者所创造



的小说殿堂。

与此同时，一批缺乏虚构和想象才华的新闻记者与原先的二流作家却洋洋自得宣称自己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文类”——纪实文学。这其实是一种把浮夸的政论文体与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加以混合的散文作品。它们用一种社会批判的外表迎合大众对奇闻轶事的无尽的需求来赢得一种商业性的成功。而商业性的成功则把这些平庸的新闻记者变成了大众传媒的明星，变成了可以和电影明星和时装模特儿类似的大众文化的新宠儿。商业的成功也促使这些人物宣称“小说”因为远离了日常生活而失掉了活力。他们试图用他们所创造的粗鄙的、杂乱的文体来取代小说。我们看到正在杂耍般的喧嚣与鼓噪声中。“玩文学”的小说实验的天才作者们面对着大众的冷遇和纪实文学作者们不停的攻击，“小说”受到了轻蔑和嘲弄。

这一切混乱与嘈杂却昭示了一种类似约翰·巴思所宣称的“枯竭的文学”的特征。以至于象朱大可和黄子平这样完全不同的批评家都在讨论着“文学的死亡”。小说应该怎样存在下去，已成了一个无解的谜。

在这种状况之下，查建英的出现变成了一个尴尬的事实。她的小说呈现了一系列难于解释的因素，成了一种无法归类的本文。查建英是从世界先锋艺术的大本营——美国归来的，但她却老实地讲故事；她具有几乎所有中国作家都难于具有的跨文化的时空经历，但她却倾向于零碎地捕捉日常生活的细小的趣味；她具有相当的文学教养，但却只显示了一个中产阶级中国女性的惶惑和焦虑。查建英难于成为任何流派和群体的一员，她的写作却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们的称赞。查建英的“小说”并不作为小说存在，而存在于小说之外。她的本文的特质的核心却在无法界定的



一切之中。查建英的独特性不仅仅是本文性的，而是在于她个人的传奇经历。而这也是她的读者渴望了解的，她用语言敞开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她的著名作品《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和《丛林下的冰河》所写出的生活处境具有虚构小说的一切特征，但又无法不使人作出“超本文”的联想。查建英在自己的文学本文中进行了一种跨文化的探究。她的小说的独特性不在于形式上拯救了小说的危机，相反在她所处理的主题中包含了中国小说所面临的困境。她的小说以一种传统的形式，细致入微的写实技巧描写在我们看来具有着某种隐喻的意义。她把“中国”及其文化的困境，以一种个人经历的方式凸现了出来。查建英赋予了她的小说一种挥之不去的，完全无法摆脱的“意义”和深度。她留下了一个紧张的文化上的夹缝，她把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间的对峙戏剧化了。

坦率地说，查建英在形式上并未给我们添加任何新的因素。查建英的出现和她极为传统的表达方式都丝毫无助于文学和小说危机的解决。在某些方面，查建英会让她最保守的读者感到欣慰，因为她毕竟在老老实实在地讲一个又一个“故事”。但查建英却又用一种独特的直言不讳表述了我们困境的全部深刻性。其他人（如实验小说作家）用激进的“形式”揭示出的东西，却被溶进了查建英的故事中间。查建英并不关注文学本身面临的问题，但她却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最好地描述了这些问题。因此，查建英和她的小说世界才是不可替代的，它显示了自身的特异性。

二

查建英近期的所有小说都在探讨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在美国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她好象一个急于倾诉一切的讲述者，

乐于把这种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加以描述。她的叙述涉及了性、政治、金钱、商品等几乎一切领域。在这些作品中，常常有一个叙事者“我”在发出音响，讨论问题。这个第一人称的叙事者对查建英的小说具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我”是与作者的个人经历相联系的某种暗示和提醒。“我”是一个“出场”的不在者，它隐喻地标引了作者本身的位置。当然，这个叙述者“我”有各种不同的经历，但它总是一个置身于美国的中国年轻女性，其身份是始终不变的。在《丛林下的冰河》中，“我”仍在读学位；在《往事距此一箭之遥》中，“我”已经踏上了回国之路；而《献给罗莎和乔的安魂曲》中的“我”则已在美国安顿下来，变成了一个华文小报的记者。叙事者“我”的这一系列使人眼花缭乱的经历都巧妙地指向了作者本人的各种经历和见闻。这里我们探讨并不涉及这些经历和见闻，而小说的本文正在时刻暗示着“作者”的出场性。其次，“我”并不象小说中所表现的那样是一个旁观者和单纯的叙事人，它是故事的主人公。“我”的生活处境事实上具有着极其广阔的蕴含和象征性力量。“我”事实上是某种特定生存境遇的征兆，是查建英的“主能指”。“我”既是个体性的又是群体性的；既是实存性的又是超验性的。“我”是独特的命运与经历，又是普遍性的生命里程。在这两方面，查建英赋予了“我”以独特的重要意义。唯一一篇脱离了这一主要方式的作品是《到美国去！到美国去！》。这部小说写的是主人公伍珍的个人经历。写她怎样由一个中国女性逐步“美国化”的过程。伍珍是查建英似乎唯一“非我”的重要的主人公。在伍珍身上，查建英更强调了她的某种“典型”或“代表性”的意指作用。“伍珍”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极为平凡的普通中国女人的名字，而伍珍的经历本身也具有着一种平庸的、适应环境抛却旧我的“经典性”的历程。伍珍可以说是查建英一切小说的一个转喻性的代表



人物，它去除了查建英以“我”作为主人公时所显示的某种超凡脱俗的气息，某种高雅的、机敏的女性趣味，而是直接地逼向了生存的实际的方面。她在这里彻底通过第三人称去除一切“自我中心”的幻想，把物质性的生存本质呈现了出来。

我们可以顺便指出，查建英似乎有某种对平庸人名的特殊喜爱。除了伍珍以外，几篇小说中都出现了“二凤”。《丛林下的冰河》中，所有与叙事者“我”经历类似的中国人干脆按英文字母的顺序 A、B、C、D 加以排列，而这一顺序是以人物出场的先后来决定的。最后出场的 D 反而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丛林下的冰河》中出现了三个有名有姓的中国人，他们是生活在西北某地的兰子、兰子的妈和老孔，但这些平凡的姓名并不标记独特的形态，它只是传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转喻性的代表。

我们在查建英的小说中发现了一个难解的矛盾。其中出现的外国人往往都能给人较深的印象。如《丛林下的冰河》中的印度人巴斯克伦和美国小伙子捷夫。《献给罗莎和乔的安魂曲》中的罗莎和乔，《往事距此一箭之遥》中的希拉。但她所写到的中国人却缺乏这种明确的指称个人的特定性。对查建英来说，这些人物都是次要的，他们不过是“中国”这一主能指的各种次能指的显现方式而已。他们构成了一个与美国和西方相对应的世界。个体的存在只是一个“民族寓言”式的主题的一个侧面和局部。查建英所写出的中国人不再是如西方人，那样具有着纯个人式的境遇，而是一个民族集体的代码。“个人”的命运的重要性并不如西方小说中所强调的那么鲜明和独特。查建英也并不试图强调个人经验的不可重复的特征。她的人物的生活命运总与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的存在的总体经验相结合。查建英完全没有涉及西方小说中常有的个人疏离感的问题，从不写个人与公众的抗争。她的个人的全部困境来



自个人无法“进入”文化的困境。她的个人不是自愿疏离或反抗文化的“反英雄”，而是试图顺应却又无能为力的局促的人。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查建英通过那些从中国游离出去的个体在美国大都市中寻找的过程，异常尖锐地凸出了第三世界处境下的中国与第一世界的美国间的二元对立。她的主题是差异与分歧，她的主人公们试图在第一世界的“丰裕社会”中寻找第三世界的处境所不能提供的一切。他们果然找到了许许多多原先所无从想象的新奇事物，但这些却又大背他们的初衷，成为对自身的一种嘲讽，查建英的主人公是一些“穿行者”和“游离者”，他们在两重世界中不停地滑动，悬浮于自身的民族和集体经验之外，而最终却像我前面所述的那样成了这种民族和集体经验的最终见证人。

查建英小说的一个“经典”的特征，是她对于美国生活的极大的丰裕的“物质”所感到的兴趣。“物质”变成了查建英的一个巨大的神话。她写到了伍珍在歌剧院做售票人时所感到的某种狂热的体验，她把这种体验变成了一种特具诗意的“梦想”。金钱和它的作用被化作了一种难以控制的主能指，它吸引了、决定了伍珍的奋斗所确定的目标，而在《丛林下的冰河》中，那个平庸、温顺的美国小伙子捷夫也是一个“丰裕”的象征性人物。叙事者“我”在谈及捷夫的那辆白色敞篷车时所具有的欣喜也是完全投入和真挚的：“这是他十八岁生日时老子送的礼。我想起我18岁生日那天，妈妈买回来半斤果脯，爸爸单只揪了揪我的毛刷子。当然这种中西比较没有什么意思。”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看似漫不经心的一笔中却流露着对“物质”本身的感情。在这里，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对比被具体化为丰裕/贫困之间的对比。这种对比一再不可压抑地流露了出来。在《丛林下的冰河》中，“我”对中国的旅行本身就时时在提醒、加深着这一对立的尖锐性和戏剧性。北京生活的平庸，

“我”在西北的小旅社时所上的那个让人恐怖的厕所，以及在上厕所时，“我”和兰子关于“院子里是否安着厕所”的讨论都严酷地表现着这种处境鲜明的差异。这种对物质的敏感几乎是任何一个面临发展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共有特征。我们还无法也无力超出物质的强大力量，我们自身的贫困也完全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物质”的匮乏与贫瘠也是第三世界所面临的苦难的最直接、最尖锐也是最鲜明的征兆。另一个也探讨过中/西文化差异的作家王蒙在他的《活动变人形》中用一大段独白式的倾诉表现了知识分子倪吾诚对自身贫困处境和西方人繁华丰富的生活的悲哀和痛苦。在一切文化差异中，似乎“物质”在这里压倒了一切。相反，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中国非常流行的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在这里也深入地探讨了东西欧之间的文化差异。他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写了《误解小辞典》来表现这种差异。但他完全没有涉及差异的物质方面，而是从意识形态和价值的角度去说明的。这恰恰说明“物”的压抑和对“物”的无能为力是一种典型的第三世界的文化特征。查建英最鲜明地揭示了这一特征的重要性和无所不在性。

但真的只有“物”的压抑和吸引吗？在“物”的丰裕的直观性之外，查建英所表现出的却是多方面的屈辱感。在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鸿沟中，存在着各种价值、意识形态和生存方式的对比。这种对比往往更加隐蔽，却也更为深刻。比如“性”的问题上的文化和意识的差异就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例子。

我高度重视查建英对“性”的独特的立场和态度。她几乎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可以自由自在地处理这个问题的中国作家。在中国作家中，一直有两类不同的“性”表现倾向。一类是认同于传统的中国道德，对这一问题持有一种规范性的文化立场。这一类的作家在迅速减少着。另一类则往往激进地反对传统道德，希望得到

爱情和欲望的自由的奔涌。这种观念和意识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问题在于，激进的反传统恰恰证明了传统的道德和价值几乎无所不在的悲剧性现实。激进往往导致夸张和失掉了自由的立场，使性问题无法得到充分地展开，它也被压抑和闭锁于言语的激进性中间而化作了纯观念性的探讨。我们往往越是激进和反传统，我们所发出的声音却显得空洞而夸张，离开我们的日常生活问题也越远。但对查建英的小说来说，美国社会的那种极大的选择性，使“性”完全日常生活化了，它变成一种随处可在的东西，一种不具有紧张和冲突性的东西。性的压抑并不需要激烈的观念性的抨击，而是可以通过生活本身加以释放的东西。《往事距此一箭之遥》是一篇混合了回忆、感伤和温婉的诗意的作品。这篇作品所探讨的中心是“性”及其所具有的不同的文化含义。一个正在归国途中的叙事者“我”遇到了中国上大学时的留学生友人希拉。“我”展开了一段关于“性”的启蒙与最初萌动的回忆。在希拉和她的文化中，“性”是一种可选择的东西，它可以并可能得到充分的实现（当然，查建英的这一立场也是简单化的）。但在中国文化中，它意味着压抑和禁止（这也同样是简单化的）。希拉启蒙了“我”但却无法超越“我”所受到的文化、语言和历史的宰制。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似乎很难理解希拉那句对她本人极为平凡而对我们则惊心动魄的问题：“比方说，假如一个你喜欢的男人和你在一起，你最想做的是什么？”这是一个让有教养的中国人既被诱惑又有些难堪的问题。而“我”和李松在一起共度的一夜则荒诞而离奇地给予了这个问题以一种“中国式”的回答。两个人一无所用地过了一种难堪、恐惧而又无可奈何的夜晚，其结果却是完全悲剧性的。他们被想象成“一夜风流”的作风问题。因而毁掉了李松的一生的前途。李松的那句“我为中国人感到耻辱”留下了一个第三世界个体精神



困境的全部悲哀。

但查建英所写出的美国生活中，“性”的问题已经完全完成了一种即时性的享受，一种自然而然，既无需掩饰又无需大肆张扬的“私生活”。我们以夸张的姿势加以宣扬和表现的观念，在查建英这里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的常态，变得完全不必大惊小怪哉。《献给罗莎和乔的安魂曲》中叙事者“我”离开了国内的丈夫，在美国和人自由同居。这里的叙述完全不是反叛性的。相反，她却在感情生活中倾慕两个美国老人间亲密无间的真挚的友情。文化的差异和区别被极大地强化了。在“性”问题之外，许多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问题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描述。

从总体上看，查建英从前所未有的独立的角度表现了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尖锐的二元对立。“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之类的概念都是一种相当模糊又极有吸引力的划分方式。所谓“第一世界”是指经济高度发展，具有强大物质和文化力量的社会和民族。第三世界则是经济较为贫困，文化和社会发展尚处于较低水平，在争取自身存在并抗拒第一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发展中的社会和民族。第二世界则是二者之间的中间项，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社会和民族。第二世界一般较少为人们所考虑，因此，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形成了一种尖锐的二元对立。这一二元对立的文化意义也就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里，第一世界的文化价值以一种无所不在的方式，通过大众传播和现代出版业的高度发展的全部成果向第三世界渗透，促使第三世界的文化向之认同。因此，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控制、压抑和吸引以及第三世界的认同、拒斥，逆反成了一种文化的主题。第三世界文化，如何处理和面对第一世界的关系，如何面对无所不在的西方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挑战，这是文化和语言领域的基本形势。查建英所特具的文化特征是一



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认同而又时感惶惑和困扰的精神情态。查建英的文化教养和生活经历当然不能拒斥第一世界价值的权威性。她的小说事实上把第一世界看作文化的中心,把第三世界看作边缘和从属的成份。第三世界的多重匮乏所带来的屈辱感,变成了一种几乎毫无希望的沉重宿命。生命被压抑、青春被吞噬,看不到可能的未来的前景。查建英所描写的那些出走者事实上是对第三世界的文化处境的“逃离”和“退出”的人。他们由边缘逃向了“中心”,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历史与母语,找到了新的价值。他们的麻烦在于脱离了第三世界的处境,但也并不能真正加入到第一世界的生活处境中。查建英的人物往往怀着一腔宏愿,希望在新大陆找到一些可以带回祖国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但新的生活无情地击碎了旧的理想,期待的幻梦沉落在物质的海洋之中。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于,对于自己的民族的生存具有紧迫意义的一切,在第一世界中却显得荒诞和可笑。

查建英在这里触及了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理想主义的终结。这是她最动人的,迄今为止也最为成功的小说《丛林下的冰河》的中心。这篇小说写到了叙事者“我”的前情人D。D是一个象征性符号,他代表着中国理想主义的最后光芒,代表着神圣中国的最后的理想和圣徒精神的呻吟与挣扎。D是一个勇敢的、对中国人民的苦难充满真挚感情的知识分子。他大学毕业之后到西北去教书了,他放弃了女友,也放弃了一切。他的下落在小说中是含混不明的。他死在了冰河之中,被埋葬了。我看到查建英写出了自己最富诗意和激情,也最美妙的段落。但问题在于,“曾经沧海难为水”,“我”告别了D,也就永远地告别了自己的理想。“我”错过了神圣的一切,走向了更广大的世界,“他对于我永远永远地失落了。因为D不是别的,而,正是我生存的某种可能,是我自身



的某种理想和精神”。第一世界的生存无情地击碎了梦想和希望。巴斯克伦这个古怪的印度人在第一世界里挣扎求生的日子似乎就是“我”的前途。旧梦已无法重温，逝去的理想无法追回了。这样，穿插于《丛林下的冰河》中的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丛林中猛兽》变成了一种刻骨的对照。其中那些纯情的、古典式的个人的生活变成了现代人的无望与无告的反讽。这里包含着无声的评论，包含着个人的绝望和对生活困境的真切的刻画。

中国理想主义的终结，是目前中国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它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话语，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实验文学”的潮流中，理想主义受到了来自语言角度的尖锐的攻击，他们把理想主义及其背后的人文热情视为一种语言幻觉和意识形态，从历史与伦理两个方面消解理想主义的真实可靠性。在他们那里，理想主义的终结具有某种玄学性和本体论特征。而查建英所做的则是把“实验文学”在抽象层面上所做的还原到日常生活的水平上。她所写出的是理想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无能为力，D的死正为这种无能为力写下了最后的注脚。查建英体验到理想主义并不足以拯救置身于文化困境中的个人，尤其是它不仅面对着严酷的、商品化的后现代的现实，而且也面对着来自西方的各种后现代理论的冲击（查建英提到过保罗·德·曼）。理想主义是幻影和彩霓，但又是肥皂泡般虚空不实，变动不居，无法追踪的东西。查建英满怀忧伤地为理想主义写下了最后的挽歌。

理想主义和参与激情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集体情绪。在中国，从五四以来，这种情绪一直在被强化和极端化。“五四情绪”变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梦幻。在西方知识分子更多地把力量放在分析、判断和思考上的时候，东方知识分子却往往沉浸在盲信和情绪化的行动主义的冲动之中。理想主义变成了一种拜物式的宗



教热情。但经过了二十世纪第三世界的不断的变革探索。人们发现乌托邦式的沉溺和陶醉只是一种夸张与空洞的言语行为。在“物质”和生活的挤压之下是极端无能为力的。查建英所发现的正是在这种全球性的物质化的追求之中(在第三世界,由于生活水准的低下和普遍发展水平的低下,这种寻觅就更为迫切),一种“后现代”的个人的“欲望”的寻求是怎样消解了理想主义的。二种享乐的企盼,一种轻松的虚无主义,一种具体的、平易的,但却在生活质量上有很高标准的生存方式,一种雅皮士式的陶醉与少许留恋,一种摇滚的节奏和体验与感觉的涌动开始随着后现代的第一世界价值进入第三世界的生活之中。查建英的小说在对以往的理想主义的感伤和凭吊之外,留下的是一种“随俗”的无奈和欣快。她的叙事者“我”不一定象伍珍那样实际和微末,但却采取了与伍珍相类似的生存方式。她的“我”最终无奈地经过几番挣扎和几番回忆而回到了第一世界都市的模糊而缺少特征的滚滚人流之中。他们再重新回归于第三世界时,已成为了一种局外人。在这里查建英表现了一个难解的反讽性的困境,她原来所写出的那些缺少特征的,象征着某种集体意识的第三世界的个体,却在与第一世界的相遇中又溶进那里的生存。她们固然具有着个人的疏离和悬浮,但却找不到表达这种悬浮的有效方式,最终依然处于后现代的生存之中。而查建英本人则找到了写作,以表达她的困境和最终“随俗”的苦衷。写作变成了解脱和超越的尝试,但写作并不能达到这种超越和解脱,反而使人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之中。对查建英来说,拯救就是空无,写作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当然,困境也是语言本身的一种症候,是一种无由逃避的宿命,而人正是在这种境遇中感受时光的流逝。查建英的困境也是我们的困境,是第三世界处境中的人之困境。



三

查建英的小说突出了一种全球性的后现代的处境。“后现代”不仅仅是第一世界的现实，而且也成了第三世界的现实。物质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别，并不足以破坏在价值论和认识论方面的虚无性。查建英建立了差别，但她又建立了同一。在第一世界的混乱和第三世界的苦难中，一种共同的“后现代”的情绪业已形成，它已成为我们所处的文化和语言的前提和环境。查建英用一种古典的叙述方式传达了一种分崩离析的“后现代”的意义。她的清晰的叙述不但没有拯救小说已被实验彻底摧毁了的信仰和可能性，相反说明了这种叙述的自身难保的特点。查建英的小说是一种绝望的努力，也是一种自得的中产阶级的趣味游戏。她的被不少传统的阐释人所称赞的“形式”恰恰呈现了“现实”的无法把握和无法拯救的光怪陆离的特征，或者说，查建英走向了自己追求的反面。她失掉了对本文的控制。我们看到在这方面查建英和王朔有某种类似之处，他们都通过唤回一种十九世纪的写作方式来超脱于“实验”的潮流。但他们都透露了这种唤回的毫无希望。王朔的反英雄们在中国都市中寻欢作乐的生涯和查建英的游走于美国都市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逃遁的风貌，事实上都彻底地打击着他们所追求的古典“风格”。因为任何“风格”都不能脱离本文的根本性意指作用的决定性的影响。于是，两个热衷讲故事的作家都把故事变得一塌糊涂。王朔和查建英不是巴尔扎克、福楼拜或者鲁迅，他们的古典式的风格多少有些装腔作势和缺少控制，他们没生在那个时代，也没有了那种机遇。他们的吸引人之处不是把故事讲得很好，而是别有招数。王朔的单薄、尖刻的语言和他的人物的隐秘

的放纵生活赢得了广大读者。王朔的语言是混合了都市痞子的机巧和纵情欢乐的笑话式的自相矛盾的东西，这诱惑着我们。他们都不是什么艺术的大师，而是后现代商品社会所创造的新式的“时髦人物”。

查建英让我们看到的是第三世界文化的广泛的危机。她用逃离来解决它，把它幽闭于某种“不在”之中，但却最终被它彻底地捕获了。第三世界文化的最终悲剧在于，曾经支撑这些文化进行伟大变革的那些西方人文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和人的尊严，在西方的思想中已经受到了如德里达、拉康、福柯这样的思想家的彻底的质疑。我们的信念变成了过时的、古老的和早已从语言领域中加以消解的东西。它们已不足以支撑我们的存在，但我们又面对着这一片动荡不宁的苦难的现实。压迫我们的不仅仅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现实，而且是生活在这现实中的我们自己。后现代并不意味着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鸿沟的弥合，却反过来通过传播与人的交流证明着这一鸿沟的无所不在性。后现代破坏了一切人文信念，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灵魂中留下了更多的“空缺”。他们原有的拯救者和“牧师权力”有如 D 的死亡一样飘然远逝，他们变得更加一无所有。查建英不过是在日常生活的领域里再一次地证实着这一危机而已。

查建英给我们许多，她又什么也没有给过。阅读查建英的小说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有趣的历险，一次无所获得的势得，一次无所谓的激情的消费，一次干枯的实在生活的片刻的中断。这里有语言、人物，有性，商品和民族情感。但最终是一无所有，只留下了空荡荡的一片游离着我们的语言的空虚的描述，剩下了这令人兴味索然的阐释性的本文。